

明清哲学与 政治哲学

吴根友学术论集



自序

从1989年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本人进入明清哲学研究领域已经有26个年头，其中虽有5年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工作，但并没有放弃明清哲学思想研究。本论文集收录的文章，既有博士毕业后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有2014年才发表的文章，时间跨度有25年之长，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中国传统哲学在未受到西方文化大量影响之前，如何按照自己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进程在向前发展。而所谓“向前发展”，即是向着更加合理化、更加接近我们现代人要求的方向发展。这种思维方式与研究方式，虽然遭到后现代思想家的批评，但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自身所固有的合理性。

在做博士论文期间，我是按照萧萐父先生的指引来研究明清哲学的现代性问题，但自2000年8月从哈佛回中国后，我在自己深入研究与探索之后，相信明清之际的确出现了中国式的内生、原发的现代性思想萌芽，这不再是一种外在教导的结果。通过我自己的深入研究，我更加坚定地相信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等人提出并坚持的“明清早期启蒙说”。我也承认，他们对“明清早期启蒙说”的某些具体论断可能有不恰当之处，但就整体性质的判断上来说，是无可置疑的。本论文集的前两个部分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明清哲学，特别是清代哲学所展示出来的现代性。清代哲学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上面，而在伦理、政治思想方面的现代性光芒有所收敛，但并未熄灭，只是表达方式上更加含蓄、隐晦。一些大思想家、大学者偶尔也有大胆的批判，如戴震直斥意识形态化的理学是“以理杀人”。而大多数人是在经学的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如焦循、段玉裁等人的新思想。清代学人的现代性精神是通过求真、求是的精神表现出来的，是在经学研究中来实现的。经学研究中所体现出的追求人文知识的倾向，恰恰是从经学内部来瓦解经学的神圣性、对经学进行知识理性的“祛魅”。当然，乾嘉史学亦参与了这场“祛魅”。本论文集的第四部分收录了两篇有关王夫之、龚自珍政治思想的文章，前一篇文章主

要是继承萧先生的基本观点，没有多少新意；而后一篇文章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代政治哲学思想在鸦片战争前夕所表现出的新气象，也将龚自珍政治思想的新内容第一次明确的揭示出来了，可供学界讨论。

本论文集的第三、四部分，主要是讨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思想，也讨论了当代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有一篇文章涉及西方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些文章都是我研究明清哲学，特别是明清政治哲学思想所引申出来的一些初步思考，并不成熟，更谈不上系统，只能算是自己在学术与思想探索的道路上留下的一个学步痕迹而已。

我愿以屈原的诗句来结束这篇短序，也算是对自己在未来学术道路上的自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是为序。

自序

明清之际哲学研究诸问题的讨论

- 003 近百年明清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027 试论明清之际“求真”与“崇公”
价值观对近世中国的影响
- 037 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及其哲学的
形上学追求
- 057 明清之际三种人性论与中国伦理学的
近代转向
- 070 “工商皆本”与晚明儒家经济哲学的新突破
——黄宗羲经济思想现代意义的再诠释

乾嘉时期哲学研究的 语言学转向

- 085 试论《东西均》一书的“三教归儒”
思想
- 102 言、心、道
——戴震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及其
理论的开放性
- 114 试论阮元哲学思考的语言学路径
及其得失
- 129 段玉裁的“求是”精神与其语言哲学
思想
- 143 “性灵”经学与“后戴震时代”个体
主体性之增长
——焦循经学与哲学思想新论
- 160 试论王念孙对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贡献

关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讨论

- 181 政治哲学新论
- 195 道义论
——简论孔子的政治哲学及其对治权合法性问题的论证
- 208 自由意志与现代中国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的人性论基础
- 221 从一国宪政到万民宪政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逻辑理路浅绎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对于当下的意义

- 239 荀子的“圣王”观及其对王权正当性的论述
- 256 王夫之的政治哲学思想简论
- 272 龚自珍的社会政治哲学新论
- 289 徐复观与儒家政治哲学
- 300 民主选举与当代中国民主选举的哲学思考
- 307 编后记

明清之际哲学研究诸问题的讨论

明清之际（约公元16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学概念，是用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学概念。有人将这一历史时期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有人将其看作是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想时期，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比附性的说法。不管如何判定这一时期的哲学与思想的性质，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这三百年里许多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的『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的二元人性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从不同层面展开了对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学的批判，从而为传统的『重论文』的伦理学向现代的『重人文』的伦理学转向奠定了人性论的基础。

近百年明清哲学研究的 回顾与展望

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看，章太炎先生是最早研究清代学术与思想的学者与思想家；然而，20世纪运用现代学术观念从事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是从梁启超与胡适二人开始的。尽管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在今天看来均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他们所开启的现代学术研究范式（或曰“路径”），无疑对后来者起到了规范与引领的作用。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将近百年来明清哲学研究概括为四种“范式”：一是梁启超、胡适所开创的比较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二是钱穆、余英时所开创的学术史的研究范式；三是侯外庐、萧萐父等人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四是现代新儒家所开创的儒学史的研究范式。虽曰四种范式，但四者之间也并非截然对立，如侯、萧二先生显然吸收了梁、胡比较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但在理论的择取上，他们则集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准绳，来评价、衡定明清之际哲学思想的性质及其得失；而现代新儒家所开创的儒学研究范式，也并非完全不采用比较的路径，像熊十力、唐君毅、刘述先的明清哲学研究，均含有大量的比较研究内容；余英时的学术史研究范式中也包含着大量的比较研究的内容，之所以将他们归属于不同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 with 理论评价尺度的不同，如钱穆与余英时主要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研究明清哲学思想，他们更重视清理明清时期哲学思想变化的内在学术理路，进而揭示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想的变化及其意义。而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各自的哲学理论并不相同，然而，他们在研究明清哲学时所采用的评价尺度基本上是相同的，即以宋儒所开创的道德理想为正宗，来衡量、裁定明清时期，特别是晚明以降思想家成就的高低；他们在儒学史内部以宋儒为理论与价值的尺度来裁断明清思想家的理论成就与得失，带有很强的宋儒的立场。除上述四大范式之外，海内外汉学中的明清哲学研究其实有非常多的学术成果，其中大部分成果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与理论深度，如辛冠洁、葛荣晋等人提出的明清“实学”思潮的说法也颇有趣味；另外，在四大范式之外，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批中年学者有关明清哲学的研究成果，也有可圈可点之处。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无法一一加以介绍与评述。

一、梁启超、胡适的明清思想研究

（一）梁启超的明清哲学思想研究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把明清三百年学术与思想作为一个特殊的思想史单位来研究，始于梁任公^①。当年，这位“新思想界之陈涉”^②，先后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讲稿，明确地把明末（1623）至清末（1923）这三百年作为一个特殊的思想史单位，将其本质概括为“道学的反动时期”。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任公将明清哲学精神概括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他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③此处梁氏所说的清代思潮，其实包括晚明的思想；其所说的“反动”，并非是一味地批评，而是包含着建设性的思想内容的。他说：“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④后来，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又将“反动”的具体内容分成五个方面：一是“王学自身的反动”。这一“反动”从刘戡山开始，其主要目标是清除“王学”中的谈玄成分，使王学更趋于“实用”，增加其道德学说的“实践性”。二是以对自然和社会风俗的探索为内容，对宋明道学、科举制度、八股文的反动。这是以徐霞客、宋应星、顾炎武等所开创的实地调查和“实事”研究的科学精神对具有中世纪道德蒙昧主义的理学与时文的批判。三是耶稣会传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反动”，从而引发了后来中国“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并使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涵发生了变化，增加了对自然科学的关怀。四是私人藏书刻书风气的兴盛，代替了宋明以来因科举制度的原因而造成的束书不观的“蹈虚”风气，从而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资料与工具。五是儒学以外佛教的“反动”，佛教一反禅宗精神，重提“净土”，并开始重视宗教的实践工夫。

梁启超将明清三百年的哲学思想分成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期（生），二是全盛

① 当然，与梁启超同时还有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一书。

②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③ 同上，第3页。

④ 同上，第2页。

期（住），三是蛻分期（异），四是衰落期（灭）。启蒙期的代表人物为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他们三人的贡献是：顾炎武倡导“‘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羁勒，直接反求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①。与此同时，对明学之反动还有三种方向：其一是颜元、李塉一派，他们反对求学问于冥想、书册之中，要求在常事中求之。其二是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然后推之于当世之务。其后有顾祖禹、全祖望、章学诚等人。其三为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端绪。全盛期代表人物为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梁启超将他们称为“正统派”。而在正统派中，以吴派的惠栋、皖派的戴震为中坚人物。蛻分期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派是从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演变而来。而蛻分期随后即是衰落期，此时期代表人物有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等人。

梁启超特别重视顾炎武在清代哲学思想转向中的作用，而且将顾氏哲学研究方法的转变看作是清代学术精神的集中表现。他说：“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崑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而“‘经学即理学’一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②梁启超认为，顾炎武作为一代开派宗师，其贡献就在于“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③三种方法中，博证一法对后来乾嘉学术影响甚深。这种方法的精髓在于：“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如顾炎武自述其治音韵学的方法是：“……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和其韵。”^④梁启超认为，这种方法“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⑤。

梁启超将清代哲学运动看作是“研究方法的运动”，而不是“主义的运动”，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乾嘉学术从形式上看虽然有与西方文艺复兴相类似之处，

①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页。

② 同上，第7—9页。

③ 同上，第9—10页。

④ 此方法实为音韵学家陈第的观点，为顾氏所引，梁启超误以为顾氏的观点。

⑤ 同①，第10页。

然其社会影响不及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①简而言之，梁启超的清代哲学思想研究大致有如下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特别重视以戴震为代表的所谓“正统派”的学术成就，将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学术“正统派”看作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高度评价了戴震在清代学术中的崇高地位及其对清代学术的巨大贡献，他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又说：“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代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这种精神即是：“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即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②他甚至认为，戴震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意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为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③其二，顾及了乾嘉学术的多面性，特别是其中的历史学成就，从而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乾嘉时代的学术风貌。

（二）胡适的明清哲学思想研究

胡适明清哲学思想研究的主要特点：一是“近世哲学”的观念下，观照明清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阶段；二是与梁启超一样，以戴震为中心，凸显明清哲学中的科学精神。胡适在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时，“近世哲学”的观念已经形成。他将中国哲学史分成三个阶段，即古代哲学、中世哲学、近世哲学。所谓“近世哲学”的内涵主要是指“印度哲学在中国到了消化的时代，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所发生的新质，便是中国近世哲学”^④。从时间上看，主要是指北宋至晚清时期约一千年的历史。后来，胡适一直沿用这一概念，只是在具体的场合下，他对“近世哲学”的具体解释稍有出入。

胡适所说的“近世哲学”，大体上可分成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发轫期（中唐），以韩愈为代表；第二个时期为成立期（北宋，11、12世纪），是“唯理哲

①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5页。

② 同上，第28—29页。

③ 同上。

④ 胡适：《胡适学术文集》（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页。

学”（理学）的复兴与形成期^①；第三个时期为完全成立期（明代以后）。第三个时期又蕴含着新的突破，即“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成立。佛家已衰，儒家成为一尊。于是又生反动力，遂有汉学宋学之分。清初的汉学家，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有‘望文生义’‘增字解经’种种流弊。故汉学的方法，只是用古训、古音、古本等等客观的根据，来求经典的原意”。^②也就是说，清代的汉学家属于第四期；而晚清直至胡适等人所代表的则属于第五期。

胡适认为，“近世哲学”的思想共性与发展趋势是：“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但中古宗教的势力依然存在；‘居敬’‘主静’‘无欲’都是中古宗教的变相。致知是纯粹理智的路，主敬是宗教的路。向来理学家说这两条路‘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实这两条路‘分之则两全，合之则两伤’。五百年的理学所以终于失败，正因为认路不清，名为脱离中古宗教，其实终不曾跳出宗教的圈子。”而“这三百年的学术界的趋势只是决心单走那格物致知的路，不管那半宗教半玄学的理学”^③。

简言之，胡适对清学研究大体上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对清代经学的特点进行了理论概括，认为清代经学有四个特点：（1）历史的眼光；（2）工具的发明；（3）归纳的研究；（4）证据的注重。胡适特别重视归纳的研究与证据的注重两条，认为“用这种方法去治古书，真如同新汽船飞艇，深入不曾开辟的奇境，日有所得而年有所成。才大的可以有创造地发现，而才小的也可尽一点‘裨绩补苴’的微劳。经学竟成了一个有趣味的新世界了！”^④

第二，对清代学术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文学作品的版本、作者问题，以及清代学术的内在脉络等问题进行了考证，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而胡适本人的这些有关清代哲学与思想、文化研究的实际学术成果，既体现了清代考据学的精神，同时又体现了他力图将考据学上升到现代人文科学高度的学术努力。

第三，将清学与现代思想联系起来，发掘了清代至现代思想史上反理学的思想家及其思想，使得中国现代学术与自己固有的学术传统结合起来，为引进西方新思想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背景。如胡适在研究反理学的思想家时，把反理学的思想发展

① 胡适：《胡适学术文集》（上），第519页。

② 同上，第13页。

③ 胡适：同上（下），第1167页。

④ 同上，第1006页。

分成两个方面、三个阶段。两个方面是：第一方面是打倒（破坏），即“打倒太极图等等迷信的理学——黄宗羲、毛奇龄等”，“打倒谈心性等等玄谈——费密、颜元等”，“打倒一切武断的、不近人情的人生观——颜元、戴震、袁枚等”。第二方面是建设，即建设求知识学问的方法，如顾炎武、戴震、崔述等；建设新哲学，如颜元、戴震等。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由顾炎武开始，顾氏实为反理学时代的开山大师。第二阶段是17、18世纪，以颜元、戴震为代表。第三阶段是20世纪初期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其代表人物是吴稚晖。

胡适明清哲学思想研究的突出特点在于：他用“近世哲学”或“近世思想史”的概念将自北宋至清代的近千年的学术、思想史看作一个大的思想史单位，与熊十力、钱穆的观点既有接近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比较强调这近千年的思想史阶段内部的思想变化运动过程及其问题意识的转化，既不过分地袒护宋明理学，也不简单地贬低宋明理学自身的理论贡献，以相对中立的价值态度来分析宋明理学思想的理论贡献与失误。在研究态度上，他比较接近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价值中立”理想。

当然，胡适本人比较相信科学精神的价值与意义，努力发掘“近世哲学”中与现代科学精神相通的思维方式与哲学命题。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他肯定了朱子学中“格物致知穷理”的精神与方法，高度肯定了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哲学如何在古典人文学研究过程中所体现的科学方法。再者，胡适本人接受了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一套价值体系，对西方近代以来的文艺复兴思想和启蒙哲学思想所主张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也持赞成的态度，所以对戴震哲学中的重视情感与感性生活的思想给予了肯定，因而难以真正做到价值中立。

二、侯外庐、萧蓬父的明清哲学思想研究

（一）侯外庐的明清哲学思想研究

侯外庐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思想史以及明清学术、思想史。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所开

创的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明清哲学思想的范式，即坚持认为中国社会有自己的早期启蒙思想，不仅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汉学界和欧美汉学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继侯外庐之后，萧萧父先生一方面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另一方面又努力避免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努力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里，寻找中西早期启蒙思想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结合起来，从而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自身任务与民族特色。

侯外庐对明清之际三百年哲学思想的研究有三个重要特点：

首先，他从整体社会性质的判定入手来评判新思想的性质，认定明清之际是中国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开始的时代；其理论判定的理由是：“17世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在16世纪中叶开始的。”^①

其次，他通过对中国与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以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为指导思想，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嬗变的世界史的一般特征与自身特质。他说：“从16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解体过程，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关键在于，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中未能走进近代资本主义世界，这即是马克思说的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因此，对于明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的新旧矛盾的分析，“既不能割断历史，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顽强传统的历史”，“又不能忽视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否定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②

最后，他从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高度来分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者的思维特点。他认为，中国早期启蒙学者往往采取抽象的理论还原形式，将自己的理想以托古改制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造成了思想的表达形式与思想的实质内容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向往未来，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过去的深情眷恋。因此，对启蒙学者思想实质的把握就必须超越其语言的表面形式，“从他们的代数学似的绝对概念中来分析他们的抽象语句背后的实质，而不能直截了当地看出他们的语言与实质之间的统

①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② 同上，第16页。

一”。“启蒙学者所使用的语言大都是古色古香的，他们爱好古代语言的形式，而想说的是近代的内容，表里又是极不一致的。”^①在中国，他们“几乎都善于用经学和自学的古代语言而推崇古代世界”，把“过去的历史与将来的历史割裂开来”。^②而另一方面，中国早期启蒙学者在自然哲学方面大多数具有唯物论倾向，而在社会哲学层面则比较倾向于将个人的道德实践看作是善恶的绝对标准。因而人性论的问题往往成为他们讨论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从而走向了唯心主义。而且，他们的思想往往不一定是他们“政治的表白”，正如列宁所说：“启蒙者没有挑出任何一个居民阶级作为自己特别注意的对象，他们不仅一般地谈论人民，甚至一般地谈论民族。”^③其表达方式往往是通过文艺、哲学、宗教等形式，因而具有普遍的抽象意义，“间接地具有政治运动意义”^④。

侯先生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剖析中国社会及明清三百年的学术、思想的特质与变化过程，引起了明清三百年哲学思想研究的划时代的革命，拓宽了明清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视域，并在政治史、经济史、文艺美学以及历史学等多学科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学术与思想的辐射力，形成了广义上的明清学术研究的新典范，从而在断代学术史的研究方面全面地将中国学术的问题意识与世界学术的问题意识联系起来，使中国历史“由国别史向世界史”的历史变迁过程由自在的形式走向了自觉的形式，并对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现代化理论形成了第一次强有力的理论挑战。当然，侯先生的这一研究范式因其固有的局限性而受到了海内外新儒家和部分研究明清史专家的批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以侯外庐为代表而坚信“明清早期启蒙说”范式的广大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掘了明清史（广义的历史，包括思想与文化史）中大量的具有近代性因素的史料，这些成就是所有研究明清三百年历史与思想史的学者都无法忽视的。其具体理论贡献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认识：

其一，他在继承了梁启超和胡适比较哲学、比较文化的广阔视野的同时，更为深入地引进一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及明清社会的性质做出了全新的解释，使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研究与近现代西方世界的学术、

①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31页。

② 同上，第3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6页。

④ 同上，第35页。

思想有了一个可以比较的理论平台。

其二，由于他引进了一套新的理论解释体系，从而也引进了一套全新的解释观念系统和解释概念系统，使被包裹在传统学术概念系统下蔽而不彰的新思想得以焕发出蓬勃的学术生命力。而且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平等与自由等一系列新哲学观念与社会理想的观照下，使得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与同时期欧洲近现代思想的差距和异同，有了一个可以比较的话语系统（尽管这套话语系统在具体运用方面可能存在着诸多问题），从而使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近代意义，以及中国社会由“国别史”向“世界史”转向的实际历史进程得以在学术与理论上彰显出来。

其三，在一套新观念的支持下，他重新发掘了一些不被重视甚至被批判的历史人物，如李贽、方以智、朱之瑜、傅山、唐甄、汪中等人的学术与思想，从而更进一步地彰显了明清哲学思想的近代意义以及与同时期欧洲近代思想的同质性，以思想史的真实性阐明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自我表达形式，显示了中国社会自明清之际到近现代的内在逻辑的一贯性，有力地反驳了部分西方学者有关中国社会停滞论的观点。

（二）萧蓬父的明清哲学思想研究

在继承梁启超、侯外庐等人的明清思想研究成果，扬弃钱穆、蒋维乔等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关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萧蓬父坚持并深化了侯外庐的明清“早期启蒙说”。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具体应用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认为“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史，并不是什么‘百家往而不返’的可悲战场，也不是什么千古不传的‘道统’记录，而是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在艰苦曲折中发展的合规律的必然历程”^①。仅以明清之际的思潮而言，“这一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标志着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及其传统思想已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尚未达到‘崩溃时期’，但已‘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阶段”^②。萧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在继承侯外庐观点的基础上，又有所深化和发展。

① 萧蓬父：《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365页。

② 同上，第366页。